

【文小馆】

岁月何仓皇，我以一篇篇小说度量人生深长

□王方晨

在东营的最初七八年，虽每年都有作品发表，而且还曾在1993年与汪曾祺、铁凝等著名作家一起得过一次《中国作家》优秀短篇小说奖，但这距我的要求相差很远。

我遇到的问题不是创作苦闷，而是信息闭塞。至1998年，危机感不断袭来。我再也不能忍受事业上的停顿，从一家外地书店购得一本《文学报刊通讯录》，按图索骥，一股脑儿将历年来所写作品全部投寄出去。

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我偶从央视节目上看到了一个叫李敬泽的人。通过屏幕介绍，得知他是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部主任，其他情况则知之甚少。我当即决定将小说《红鬃马》投寄给他。不久，接到了他的一封信和一张名片。他在信中表达自己对小说的赞赏和不能在《人民文学》发表的遗憾，并向我索要新作。

我随后向他投寄了两个刚完成的短篇，《说着玩儿的》和《乡村火焰》。很快，一天夜里，接到了电话。他告诉我两篇作品将在《人民文学》同期推出，并要我只要写了作品就寄给他。放下电话，我隐隐意识到自己盼望的一天终于就要来临。

按照李敬泽对我的规划，要先在文坛混个“脸熟”，《人民文学》便只发了《乡村火焰》，《说着玩儿的》则被他另行推荐到了《东海》杂志，《小说选刊》转载时配发了他精到的短评《山野间的先锋》。

仅2000年，我就在《人民文学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上海文学》《山花》等国内重要文学期刊发表近二十余篇小说，《说着玩儿的》《王树的大叫》《扑满》《乡村火焰》等接连被《小说月报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转载。《王树的大叫》次年入选《北京文学》“2000年全国最新文学排行榜”，后又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。在国内颇有影响的《青年文学》，还于2000年第11期将我做了封面人物，同期发表《黑妮儿飘飘》《扑满》两部中篇，《作家文摘·青年专刊》也随后推出专版介绍我的创作。

也许直到这一年，我才坦然接受自己专业作家的身份。

2001年，作为山东省青年作家代表，我与张海迪、张宏森、张继、凌可新，一同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，第一次与著名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见面。而在2004年3月，我参加鲁迅文学院第三届全国中青年作家研讨班，李敬泽则成了我和其他六位同学的导师。

李敬泽先生曾在文章中写道：“王方晨有力量。”他尚不知这力量源自何处。而我认为，它来自于对文学和生活的信心。认真对待文学和生活，给我的写作以意外的力度。

2005年10月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、山东省作家协会在东营联合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，李敬泽先生专程赶来参加，评论家吴义勤、施战军、李掖平、黄发有等都对我的创作给予了各种评价。

研讨会后，我仍然不停自省。信念的力量不应减弱，而应加强。人生天地间，公道应是第一要义。从我的第一篇作品《林祭》开始，我的几乎所有作品，无不在诉求着爱的公道、理的公道、生的公道，呼唤着人间正义与良知。

到2009年底，我被济南市作为高级人才引进至《当代小说》编辑部，担任副主编，告别了长达19年的专业创作。

这一年，我被评为山东省作协首届签约作家。

从2004年冬开始，我刻意对朋友们隐瞒了自己染病在身。大病常使我含泪不止，严重影响了心态和对人生的看法，使我的创作隐含了莫大的悲情。

这期间，我专为李敬泽精心创作了两部我自己满意的作品，《水袖》和《暗处之花》。《水袖》是写农村两姊妹的感情故事，是对当下农村女性命运的思考。《暗处之花》则写了一位在城市奋斗的农村女性异乎常人的决绝。几年

后，吴义勤看到这部作品，在我的研讨会上从东西《篡改的命运》说起我早在十年前就在探讨怀念乡土还是切割乡土的问题。但这两部作品都没能到达李敬泽手上，分别刊于《中国作家》和《山花》。

没等三年签约作家的创作结束，我已病体难支，不得不开始漫长的治疗。

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，我在2013年某月一口气写下四个短篇，其中一个就是短篇《大马士革剃刀》。小说当即被《天涯》杂志留用，并于次年7月发表在第4期。

《大马士革剃刀》刊出之前，《当代小说》举办过一次小说笔会。一位河北作家对我表示疑惑：“王老师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？”我唯有苦笑。

在这篇小说里，我融入了自己的生命痛感。它跟我的生活密切相关，是写了我生活的城市济南。我把目光投向了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里逐渐消失的老街巷，一下子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。有人说，别看是个短篇，但它却有长篇的容量，不能仅仅拿它当短篇来看。

小说很快就被国内多家文学选刊头题转载，在毫无意外的情况下，登上了当年中国小说学会全国短篇小说排行榜，次年也连获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和《小说选刊》年度大奖。

有一点遗憾，是在当届的郁达夫小说奖评奖中，本没有疑问的结构极严密的小说，竟被提出疑问。小说中的虐猫凶手，被评委们错安在了无辜者剃头匠的头上。显而易见，具有赤子之心的受害者剃头匠，才是我同情的对象。

受这篇小说激励，我又用四年时间创作了10篇以老实街为故事场景的短篇，组成了作家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长篇《老实街》，共11章。

在2016年5月，我的作品研讨会在济南召开。会上，评论家们充分肯定了《大马士革剃刀》的成功，结合我的创作，提出了“塔镇”和“老实街”两个文学地标。吴义勤先生讲我是既有爆发力，又有耐力的文学长跑者，让我感慨。我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不得不写。几十年来，我所凭恃的，也唯有去写。

《老实街》出版后，《文艺争鸣》《小说评论》都给做了影响颇大的评论专辑，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》《南方文坛》《扬子江评论》也相继推出了评论，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中华读书报》《文学报》等也没落下。2018年12月，中国作协创研部和山东作协联合，在北京开了研讨会，众多评论家在场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。

2020年，我又精心写了《凤栖梧》，还是老实街故事，意图《老实街》再版时收入，以形成12章的架构。小说发表后，创了国内年度选载纪录，也是一个非常被看好的短篇。

可以说从2015年起，我又进入了创作爆发期。这一年9月，在经过三年半的治疗后，折磨我长达十一年的病魔彻底解除。完全恢复健康的我，不断发表新作之外，又连续出版了《老实街》《花局》《背后》《大地之上》等数部长篇，还有一些作品集，而且身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2018年1月，我被推选为山东作协副主席。2023年，过完春节，我就动笔新长篇，目前接近完成。

回顾漫长往昔，我发现自己写下的小说，已近千万字。这在我发表处女作时，绝对不敢想象。当时，我时常幻想，能够有七八篇小说发表也就满足了，还会禁不住用手比划七八本杂志摞在一起会有多厚。

1987年，一对恋人被我放逐在《林祭》中的原始大森林，面对神圣的大自然，冷静反思昨天，体味现在，辨认未来。其实，从那时候起，我也放逐了自己。

岁月何仓皇！在文学的广野上，我以《林祭》这样一篇篇小说，度量人生的长度和深度，至今犹未止息。

□刘学光

路过街边的西瓜摊，滚圆的大西瓜水灵可爱，每每看到它，就忍不住回忆起儿时偷瓜的往事。

小学三年级时的暑假，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我们四个小伙伴吃过午饭，就会到村西的大河去抓鱼摸虾洗河澡。有一天中午，天气闷热，火辣辣的毒日头似乎要把人烤焦，我们撒欢一溜小跑，奔大河而去。

经过有五六亩地的瓜田时，发现一个大西瓜硕大滚圆，就靠路边，几步之遥，伸手就会成为囊中之物，就能解解我们的馋瘾。可是瓜棚高高的，像瞭望塔，看瓜人一转眼就会发现我们。

我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和其他三个小伙伴一商量，决定智取“西瓜王”。看瓜人是我本家的二大爷，是出了名的大公无私，外号“老认真”。但他挺喜欢我的，经常给我讲故事听。于是，就由我到瓜棚与看瓜人周旋。就这样，我高兴地坐在瓜棚的草帘上，与看瓜的二大爷下起了军棋。

我特意坐到能看到小伙伴偷瓜的位置，让二大爷背对着他们的方向坐着。我边下棋边往偷瓜的方向瞅，二大爷一手端着长烟袋锅，不时吸上几口，一手拿着棋子，不时双眉紧锁，举棋不定。我则边跟二大爷对弈，边从高处往下偷瞄。眼见着小伙伴们已经得手，抱着提前观察好的那个胖圆大西瓜，蹑手蹑脚地往大河边那片茂密的槐树林走去。直等看不见他们的影子了，我才装着要方便的样子，出了瓜棚。然后一口气奔到了大河边。

我们在小树林里兴奋地交流怎样消受这“偷”来的战利品。当我用一块带尖的石头把大西瓜一割，霎时间西瓜就崩开一条大缝。小伙伴大勇长得胖，有力气，只见他用手指一掰，西瓜就分成了两半。然后我们又用尖石分成小块，四个小伙伴一阵狂吃，不一会儿，滚圆的大西瓜就只剩皮了。大勇还不过瘾，捧着瓜皮又啃了几口。我们个个摸着撑得滚圆的小肚皮，喜笑颜开，开心满怀。小伙伴大鸣还直打饱嗝，好像西瓜已经吃到他脖颈一般。

捧着滚圆的小肚皮，我们又来到大河里撒欢。河水清澈见底，缓缓流淌，不时有小鱼儿与我们亲近。小伙伴大飞偶尔来几个扎猛，捞几个小蛤来展示他的技艺。大鸣和大勇还打起了水仗，欢叫着，嬉笑着。我们欢腾在这清凉的河水中，神清气爽，快乐无比！

一会儿工夫，我们就不觉得撑得慌了，但那西瓜的甜美还在心中荡漾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们还都咂着嘴，意犹未尽。那时谁能捞着个西瓜吃呢？唉！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。

多年后，遇到在村头晒太阳的二大爷，拉起呱来，他跟我讲起那次偷瓜的往事：“其实，我早就知道你们耍的鬼把戏。可是那天太热了，让你们吃个西瓜解解暑，也过把馋瘾。哈哈！”

我一时愣住，好久没有说出一句话，但是心里暖暖的，感激的泪水不禁在眼眶里湿湿的、潮潮的。

【风过留痕】

偷瓜记